

光影之约

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报道



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生动回溯了1942年舟山渔民英勇营救“里斯本丸”号船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。

16位英军战俘后代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，见证《里斯本丸沉没》首映 战火中缔结的中英情谊永不褪色

■本报记者 王彦

“我真的很想见见中国渔民的亲人。”丹妮丝·维尼在大银幕上看完了《里斯本丸沉没》，久久不能平静，“父亲一直说，那些中国渔民是英雄，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我”。

2022年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“里斯本丸”号船幸存者家属，鼓励其继续积极致力于中英友好，期待更多英国朋友为中英关系作出贡献。习近平主席指出，1942年中国浙江省舟山渔民英勇营救“里斯本丸”号船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，是中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、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，也是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佳话。

当时收到这封特殊来信的，就是现年75岁的丹妮丝·维尼，“里斯本丸”号船最后一位幸存者——丹尼斯·莫利之女。昨天，反映这段历史的纪录片《里斯本丸沉没》在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，包括她在内，16位英军战俘后人来到上海。上影节现场，他们与影片主创团队、中国香港的历史研究者深深拥抱。丹妮丝·维尼相信：“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永远是朋友。”影片导演方励说：“战争年代，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有如此勇敢的壮举。我想把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中国人民的故事告诉世界。”

一封书信、一部新片、一群人，当80多年前的故事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眼前，引发强烈共鸣，大家的心意是相通的——为了不会忘却的历史，为了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永不褪色的情谊。

超越血缘与国度的情谊

《里斯本丸沉没》不是一部通常意义的纪录片，片中并没有穿插过多专家、学者的评述，而是结合相关文献、历史实物、人物口述、现场采访、珍贵历史影像、还原事件的动画等，揭开一段曾常年被淹没的历史真相。大银幕上，一位位历史见证者、亲历者的影像甚至只是声音传来，真实自有千钧之力，上海影城3号厅内一片啜泣声。

电影要从一艘船讲起。1942年，日军征用“里斯本丸”号客货船押运1800多名英军战俘从香港返回日本。途经浙江舟山群岛东部海域时，由于日军违反《日内瓦公约》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识物，“里斯本丸”号于10月1日凌晨被美军潜艇“鲈鱼”号发射的鱼雷击中。日军驱逐舰和运输船赶来救下日军官兵，但船上日军转移的同时，我忍地封闭了关押战俘的3个货舱舱口。被困的英军战俘设法自救，10月2日凌晨，在“里斯本丸”号彻底沉没之前，他们打破舱盖，冲上甲板，冒着被日军机枪扫射的风险跳海逃生。

危难之际，舟山渔民冒着生命危险，划着小舢板而来。他们折返于海域和岸边，数十个来回，竭尽全力将幸存的384名落水战俘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自身贫困的渔民们还纷纷拿出衣物、饭食，为这些金发碧眼、语言不通的“异乡人”安排安身之处……

丹尼斯·莫利在“里斯本丸”上被日军关在了2号船舱。2019年，时年99岁的莫利对着方励的镜头说：“鱼雷击中船体时，巨大的响声从船底传来，灯灭了……后来船体开始倾斜，关于那一刻我能回想起的就是恐慌。”维尼至今记得父亲讲述时的神情，“是中国渔民的出现改变了一切”。昨天在上海，丹妮丝·维尼回忆，父亲年轻时，她陪伴他度过了21年，“直到2019年摄制组来采访，我才第一次听父亲那么仔细地讲述战争期间的经历……2021年1月3日，父亲去世，那天是我的生日”。

另一位战俘后人被观影现场的氛围深深触动：“82年前，没有血缘关系的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伸出援手。今天，在场的中国

观众，他们与我们的亲人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我看到很多人流泪了。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还有这么多中国观众关注这段历史。”

不曾画上句点的怀想

就在丹尼斯·莫利他们被舟山渔民相救的同一天，另有800多名英军战俘或被日军射杀，或被困船中，永远沉入东极岛海域的海底。

简·克莱门茨和凯瑟琳·伯奇是遇难者肯尼思·霍金森的侄女和表妹。《里斯本丸沉没》中记录下一个细节，几年前去这个家庭采访时，她们带方励去了趟墓地，那里有个空墓。这一次，她俩将一块重2.4千克、长12英尺、宽8英尺的石碑带来中国。那是她们为长辈准备的墓碑，上面刻着霍金森遇难时的年龄——22岁，编号——3055984，以及遇难时间——1942年10月2日。在上海参加完电影的首映后，一行人将启程前往浙江，这块墓碑也将沉入遇难者长眠的海底。

“我一直想感谢中国的老百姓，尤其是舟山的渔民，没有他们的义举，就没有今天的我坐在这里。”肯尼思·安德鲁·萨蒙说，他的父亲从“里斯本丸”死里逃生，但余生都活在创伤和内疚中。他的很多战友都遇难了，而他却活了下来，“很长一段时间，父亲不愿意谈论这件事。后来，他开始写回忆录、手绘图，以此记录在‘里斯本丸’上逝去的人们”。

年过八旬的雪莉·班布里奇满头白发，可出现在《里斯本丸沉没》中的她手里一直拿着一个保存完好的黑发娃娃。娃娃是父亲格莱德·泰勒从中国香港寄给她的礼物，也是她对父亲唯一的记忆。影片里，泰勒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话——“我们推测他在战争中死在了中国东海”。由于健康原因，雪莉这次没能成行，代替她来中国的，是其子菲利普·格雷厄姆·班布里奇。身为英军战俘的第三代，菲利普很感

激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问世。“我妈妈一直在等待她的父亲回家，抱着那个洋娃娃，等了一辈子。”他说，妈妈一度无法释怀，还公开登启事找寻是否有人知道父亲的下落。“看到纪录片的粗剪版后，她终于知道了父亲因为什么失去了生命”。

林赛·莎拉·阿彻是约翰·维沃尔的侄女。80多年前，约翰在香港爱上了一个中国女孩，他在家书里告诉妈妈，“我想我们会结婚”，随信附上一张小相片。许多年杳无音信，直到家中再次收到来自中国的消息，是关于那个女孩的。中国姑娘谢绝了战后英方提出的死亡抚恤金，提出“它应该送去英国，给约翰的母亲”。

不只是英军战俘的后人们不远万里来到上影节现场。吴布伟从浙江赶来，他的祖父是当年参与营救的渔民吴其生；胡克顺之子胡亦芳在观影后告诉记者：“电影里听到了我爸爸妈妈的声音”；研究“里斯本丸”的香港历史文化学者沈健也来到上海，他将2006年为莫利老人拍摄的照片冲印、放大，作为特殊的礼物赠予丹妮丝·维尼……

观众席里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。44岁的吴似真是“里斯本丸”沉船事件的民间纪念活动组织者。2017年以来，她一直与丹妮丝·维尼保持密切联系，这段跨国友谊延续至今。昨天的上海首映礼后，年龄相差31岁的她们给了彼此一个深深的拥抱。7年的中英志士交“奔现”时，英国老人分外动情，“在海上，我们都是家人”。

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片头与片尾，中国、英国、法国、马来西亚……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名字一一显示。这些都是影片能问世的幕后工作者，他们曾经素昧平生。用影片的历史顾问、英国历史学者托尼·班纳姆的话来说，这群人聚到一起，携起手来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“人”、生而为人的价值取向，是在法西斯暴行之下，人类用正义驱散邪恶，以团结争取和平的共同回忆。

中国渔民的壮举应当被世界知道。“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。”



影片摄录了大量当事人后代的口述史料，图为方励（右）采访“里斯本丸”号船英军战俘后人。



为还原历史真相，摄制组足迹遍布多个博物馆、史料馆、纪念馆，图为方励（坐者）翻阅历史文献。



2019年，英军战俘后人来到舟山，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援的中国渔民。

（本版图片均片方供图）

■本报记者 王彦

30°13'44.42"N, 122°45'31.14"E, 浙江舟山群岛海域。

昨天10时，《里斯本丸沉没》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。进场前，不少观众对影片的认知停留在“它是彰显人性光辉、勇气和跨国界大爱的”或“它是本届上影节最快售罄的影片之一”。123分钟后，许多人认同导演方励所说的——一个坐标被清晰看见。

打捞历史

时间倒回2013年。在东极岛拍摄电影《后会无期》时，方励从舟山渔民口中第一次听说“里斯本丸”沉船事件。“我大受震撼，感动于中国渔民的壮举，也放不下那些英军战俘。”3年后，方励决心拍摄一部面向全球观众的纪录片，打捞这段历史，也打捞1800多个被人遗忘的战俘故事。

2016年起，方励重拾他的“第一职业”。对今天的电影观众而言，方励更出名的身份是《乘风破浪》《百鸟朝凤》等影片的制片人。事实上，他还是一名海洋技术专家、地球物理学专家，从业超过30年。带着好奇，他开始调查历史。“调查历史、澄清历史，要有物证，按照记载的沉船坐标，我们去搜寻‘里斯本丸’，前10天一无所获。”2016年10月，他率领工业团队首次定位沉船位置，得到沉船水下三维形态，绘制出了声响图，“那个位置距离我们从日本外务省查到的相关定位相差36公里”。

不惜周折将“里斯本丸”沉船事件搬上大银幕，导演方励说——

一个坐标被清晰看见

确定了坐标，方励更生出一个使命感，“800多个年轻人葬身于异国他乡的海底，他们是谁，发生了什么？”2018年，他首次赴英，与有关方面达成协议，3月首次到舟山调研，采访当时唯一在世的亲历者渔民，94岁高龄的林阿根；4月，摄制组在英国辗转20多个城镇，采访了18位英军战俘后人，足迹还遍布各大博物馆、史料馆、纪念馆；7月，方励接受了英国媒体的采访，并在当地报纸上整版刊登寻人广告；8月，摄制组二赴英国，联系上28位战俘后人；10月，报纸上的整版广告又帮他们找到一位幸存者，团队立刻起身奔赴加拿大，和时年98岁的威廉·班尼菲尔德对话；11月，日本大阪、神户、东京、横滨，方励团队走访博物馆、日本外务省、战俘营旧址，调阅大量机密文件，甚至通过当地侦探社找到了“里斯本丸”船长经田茂的女儿……

密集的时间里，方励和他的团队同近380位战俘家人取得联系，收集上万张历史照片，面对面采访了近120位战俘后人。最终与观众见面的成片123分钟，那是方励后期剪辑时经历“天人交战”取舍过

的。“我希望它是包含各个方面核心当事人及后人讲述的。惟其如此，才可能将碎片拼成一段相对完整的真实的历史。”

“重返现场”

其实，随着近些年媒体的深入报道和相关研究的展开，“里斯本丸”沉船事件的公众知晓度在逐步提升。此前，电视电影《东极拯救》曾在CCTV-6播出；上海出品的电视纪录片《亚太战争审判》中也有对这一事件的亲历者采访。只是，用电影纪录片的方式来表达尚属首次。

为什么要不惜周折将纪实故事搬上大银幕？方励的理由是“一个内心的承诺”，电影交付的是2000多个家庭的希望和期盼。“1800多个战俘家庭希望看到他们父辈的经历；200多个舟山渔民家庭，他们父辈的善举、壮举理应被记住。”而当观众在大银幕上见到成片，看见用电影手法复原的一段历史——被鱼雷击中到完全沉没的25小时里所发生的无数惊心动魄瞬间——一切会明了。

带着历史的温度，《里斯本丸沉没》链接起的是许多关于生命与人性的感同身受。爱情、亲情、战友情，所有那些人性美好的情感都在战争中戛然而止，随年轻的生命长眠海底。战争留下了一座座墓碑和生者绵长的伤痛，方励说，“每天都在虐心，似乎经历了一场完整的战争”。

上海首映礼，许多观众泪流不止。此情此景让他确认，“重返现场”何其珍贵。一方面，摄制组几经周折采访到的事件最后三位亲历者——两位英军战俘幸存者者和一位参与营救的舟山渔民林阿根，如今都已不在人世。这些抢救式的影像，将与其他的史料一同汇入人类历史。另一方面，在为“里斯本丸”交付心血8年后，历史也已经“长”到了方励自己的生命里，“我可能再也放不下了”。

在上海完成首映后，片方将力推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国内公映以及全球发行。“我真诚希望，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平台，这段历史会被更广泛地看见，一个坐标会被铭记。”方励说，那是一部电影的至高价值。